



到深圳博物馆 观云冈石窟艺术

——“文明丽迹——北魏平城与云冈石窟艺术特展”开展侧记

本报记者 赵小霞 赵小霞



12月6日，“文明丽迹——北魏平城与云冈石窟艺术特展”在深圳博物馆历史民俗馆开展。展览由深圳博物馆联合云冈研究院主办，故宫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

博物馆、河北博物院、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沁县南涅水石刻博物馆、蔚县博物馆等8家单位协办。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文旅融合发展中心主任崔晓霞，以及深圳博

物馆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展仪式。本次展览旨在借助北魏平城遗址和云冈石窟艺术，展示5世纪“一带一路”的历史与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进程，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文化建设。本次展览展出云冈石窟相关展品237件(套)，包括北魏文物珍品、云冈石窟第12窟音乐窟大型全景3D复原窟、石窟相关史料等，全面展示北魏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丰硕成果，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达106件(套)。展出的重要文物有：目前云冈石窟在北魏造像题记外的唯一一件刻铭器物“莲瓣纹石盒”，钵底阴刻铭文“妙兴西北方主”，北魏前期造像借鉴凉州新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朱业微石造像”，雕刻图案尽显佛教、鲜卑、汉文化融合气象的“大同北魏贾墓石灯”，大型圆雕佛头造像等。

展览分为中厅(互动区)和第二专题展厅(文物展厅)两部分。第二专题展厅展示内容分为《五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四方都会》《雕饰奇伟》《创艺垂范》四个部分。展览还辅以云冈石窟720度全景浏览、数字互动游戏、放映厅等充满互动性、趣味性的多媒体装置，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云冈石窟建筑神韵和雕像之美，深度感受云冈石窟深厚的历史文化。真切地体会民族交融、文明交汇的独特时代魅力，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高达9米的第12窟音乐窟大型全景3D复原窟，坐落在展厅一楼中厅。为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云冈石窟第

12窟美轮美奂的风采，深圳博物馆运用高新技术，通过数字化采集、3D打印技术1:1原比例精准还原气势恢宏的洞窟、形态各异的雕塑与绚丽多姿的壁画。观众不仅能沉浸式游览洞窟，还能通过配备的高清放映厅、知识图谱互动屏、人机互动小游戏、手绘文物展示墙等开启丰富的互动体验。

第二专题展厅以考古文物为依托，分为“五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四方都会”“雕饰奇伟”“创艺垂范”四个部分。“五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展在世界格局、南北朝局势两方面铺陈历史背景；第一单元“四方都会”通过出土的石刻、陶瓷器、金银器、珠饰等，诠释北魏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面貌；第二单元“雕饰奇伟”通过皇家建筑构件、石窟寺雕刻及泥塑等文物，展现云冈石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丰硕成果；第三单元“创艺垂范”则借助东北、华北等地出土的文物及传世珍品，叙述云冈石窟对北魏洛阳时代及后世艺术文化的深远影响。

作为深圳博物馆2023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讲座，当日下午，张焯在深圳博物馆历史民俗馆中厅第二专题展厅作了《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首场讲座。讲座由深圳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黄阳兴主持。本次讲座，张焯围绕“山西大同的历史地位”“佛教的诞生与东传”“云冈石窟艺术”三个方面，为观众深入解读了云

冈石窟这一“东方佛教第一圣地”。张焯讲到，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齐名，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北魏定都平城的九十七年，是中国佛教成长壮大、方兴未艾的关键时期。云冈石窟作为唐代前中国唯一的大型佛教石窟艺术宝库，不仅对后世石窟建设、美术发展影响极大，此间引进、形成、确立、巩固的佛学思想，以及僧官体制、僧尼制度及寺院经济模式，也对后世佛教发展影响深远。张焯的讲座精彩纷呈，不时赢得听众的阵阵掌声，现场听众互动提问，气氛热烈。

云冈石窟第12窟建造于公元470—494年，是因色彩异常绚丽而得名的云冈“五华洞”之一。其前室雕刻了众多演奏各类乐器的伎乐天形象，又被誉为“音乐窟”，是中国古代较早的“宫廷交响乐团”。洞窟前堂后室的形制，既反映了北魏平城时代的宫殿建筑面貌，也揭示了佛寺建筑对宫殿建筑的模拟。为配合展览，未来5个月，深圳博物馆还将推出担鼓、法螺、玉嘴笛、细腰鼓、笙篥、箜篌、琴、横笛、琵琶、排箫、齐鼓、吹指等大型交响乐“演出”，舞台将1:1还原乐队初创细节，在现场，观众可360度零距离观演，与1500年前的“乐队”共舞。

据悉，“文明丽迹——北魏平城与云冈石窟艺术特展”至2024年5月24日结束。



游客体验数字互动游戏



全景3D复原窟现场



艺术特展展厅



游客参观文物展厅

图之万形，1500年前的云冈雕刻(下)

付浩

悠悠千载，遗产保护任重道远

“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这是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的云冈美景。然而，从其惊雷般诞生伊始，云冈石窟即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衰落之路。伴随迁都，云冈石窟陷于衰落，至北魏后，历朝仅以修缮为主。有唐一代，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云冈未再有大型工程；辽金时期的主要工程限于大规模修整；到明代时，石窟几近荒废，寺院建筑也被焚毁；清顺治八年，木构窟檐和寺院得以重修，康熙皇帝还曾为云冈寺御书匾额“庄严法相”，乾隆年间亦对石窟有所修葺。

尽管历朝历代都有过修复的善举，到上世纪初，饱经千年沧桑的云冈呈现出荒凉、破败的景象，绵延一公里的石窟群被前代的军堡残垣分隔东西，西部洞窟变为民居、马厩，炊烟袅袅，无复庄严；东部洞窟坍塌、颓废，明清崖刻，无复风骚；中部孑然独存的石佛古寺，香客寥寥，不再是众善趋瞻的清静胜地，浸入一片孤寂。同时，由于石窟

区所处的地质及环境条件的变化，云冈石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自然风化；由于历史上有过多次无人看守的时期，石窟遭受过人为破坏，致使洞窟及雕像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得到国家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为云冈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我们要用3年时间把云冈石窟修好，一定要把这座人类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从此，云冈石窟大规模的保护维修工作全面展开！从1974年开始，国家投入巨资，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的原则，用三年时间完成主要洞窟的大规模抢险加固，基本解决了洞窟的稳定性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石窟的原貌，云冈石窟如获新生。

这其中，有一例摘掉木鼻子——为云冈大佛“整容”的故事：云冈第18窟，高达15.5米、身披千佛袈裟的主尊立佛像挺拔宏伟、气宇轩昂。然而，这尊号称大型化的键陀罗式佛像，曾经有过不幸的遭遇，佛像面部一派惨不忍睹：眼

睛、脸庞部分缺失，鼻子则完全掉落不存。不知在什么时候，人们为其安装了一个长约60厘米左右的木鼻子，使其看起来端庄些，但由于木鼻子的质地及其形状不能完全与砂岩质感相配，无论如何也是一张不能使人感到协调的佛像面部。

为此，在1974—1976年的云冈“三年工程”中，经过多方论证，决定为其“整容”，在将眼睛、脸庞等面部缺损部位整体修饰的同时，将木鼻子摘掉，以当时最合适的施工方式(石料垒砌粘接)，为其重新“安装”了石雕鼻子，使佛像面部恢复本来面目。现存1974—1976年《云冈石窟维修工程技术报告》列表中的第18窟“残破情况”曰：“主佛面部不整后配木鼻子”，列表中的“维修概要”曰：“主佛木鼻子改用石雕”。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18窟佛像面容。

从“三年保护工程”到“八五”工程；从109国道云冈段改线工程到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2002年云冈石窟启动防水工程到2007年西部窟群严重渗水问题得到治理；从2008年启动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到2012—2015年五华洞危岩加固、彩塑壁画修复、保护性窟檐建设全面完成；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研究性保护；从普及传承云冈文化到深入开展“云冈学”研究，云冈石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数代云冈人栉风沐雨、砥砺奋进，始终把保护文物作为首要任务，为实现云冈石窟长久保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云冈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文物保护、档案记录、展示利用、数字化建设、考古研究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走上了一条预防性、综合性保护云冈石窟的科学之路。

探秘索隐，云冈研究行将致远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以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则是近百年之事。

最初半个世纪的云冈研究，以日本学者居多，包括大村西崖、塚本靖、关野贞、常盘大定、小野玄妙等，主要探讨云冈石窟的建筑特征和艺术源流。中国学者则重在解析云冈历史与建筑，介绍邻邦的研究成果。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一行考察云冈石窟，对北魏石窟建筑进行了测绘研究，并发表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在云冈石窟，他们克服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等诸多困难，对石窟的建筑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们发现中期洞窟中飞仙的样式虽然甚多，大约可分两种，前者着印度湿折的衣裳而露脚，多肥胖而不自然，带有明显的印度特色；后者着短袈裟长裙而不露脚，具有明显的汉代石刻特色。他们还在中期洞窟中发现了爱奥尼亚和柯林斯等希腊式柱头的影子。

经过大量的观察、测量和计算，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掌握了大量有关云冈石窟建筑特色的第一手资料，并与营造学社同仁们整理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在文章中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窟的价值。梁思成说：“在云冈石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它们通过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地。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赋予我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也是近代史学者最重视研究的问题。”

正是这一观点，揭示了欧洲、印度、波斯、中国等多种建筑雕刻文化在云冈石窟的融合、交融和发展，揭示了云冈石窟在建筑雕刻方面民族化和世界化的特性，一举奠定了云冈石窟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价值，为云冈石窟烙上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烙印。

今天，当我们徜徉在云冈石窟这座集希腊、波斯、印度、中国古代建筑特色于一体的建筑艺术宝库中，看到石刻的木制阁楼、“肥腿”飞天、一斗三升拱门，眼前便会浮现出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

影子，想起他们当年与云冈石窟的美好邂逅。

谈到云冈的佛教考古研究，要从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说起。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籍时，在缪荪荪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引《析津志》内，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的原文。该碑撰于金代皇统七年(1147)，原碑实物早已不可寻踪。其所述内容涉及了北魏历代开窟建寺的问题，更可贵的是弥补了唐代贞观至金代皇统约五百年间云冈石窟修建的历史空白，这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

碑文中提到两块北魏碑记：“一载在护国，大而不完，无年月可考。一在崇教，小而完。”后一碑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这是云冈石窟有明确营造时间的记载，可惜现在已不能目睹。根据《金碑》记载，1956年，宿白先生发表了《金碑校注》论文，使“云冈分期论”以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和佐证。宿白先生在1978年以一篇《云冈石窟分期论》推翻了日本学者的分期和方法论，重新划定了云冈石窟的三个时期与相应的造像特征，从根本上改写了云冈研究的基础时，日本学界自然无法按捺。1980年和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和《云冈石窟之谜》两篇文章，对宿白的研究进行了反驳，甚至质疑其所用文献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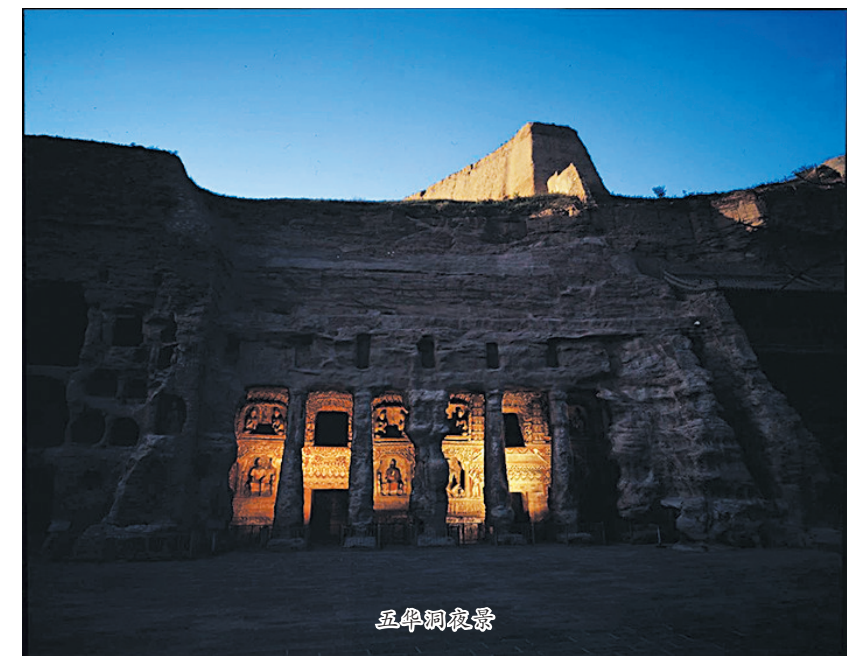
于是，宿白先生在1982年特意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一文，答复长广的质疑，并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阐释。在严谨的论证面前，长广敏雄最终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至此，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成为了世界云冈研究领域不可忽视、无从绕过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9年，原云冈石窟研究院用了7年时间出版的《云冈石窟全集》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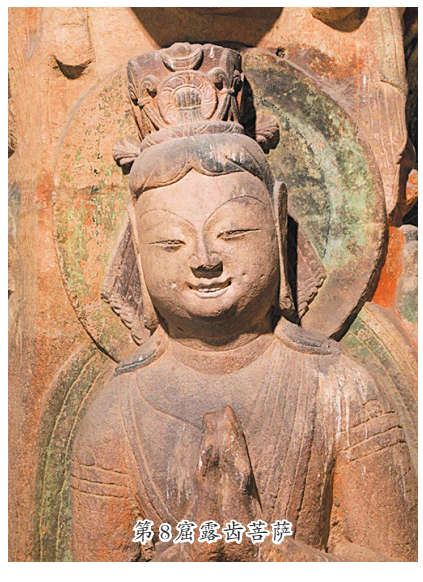
本，成为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在这套全集中，除了全景式展现了所有石窟群的雕刻内容，价值尤其突出的还在于对历次考古成果的披露与梳理。而这些成果，很多都来自短短五十年之内的发掘与研究。在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学术性方面，全面超越了日本学者的著述，改变了以往“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状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21年，云冈研究院成立，《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全三册)、《云冈石窟中世纪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冈研究院论丛》等云冈研究专著陆续出版，云冈研究开启了新篇章。

置身于雄伟辉煌的云冈石窟内，感受1500多年前石头造像的神韵，从万佛灵境的东方微笑，从伎乐飞天的灵动飘逸，从各种纹饰的优美舒展……看到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承载及胡汉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的印记，倍感云冈石窟正是不同文明交流融汇的结晶。

在塞外的平城大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某种声音越过松林花草和群山传来，永不停息，这就是云冈的声音，随着云冈之声永不停息的，还有鲜卑时代的精神……



五华洞夜景



第8窟佛造像